

# 《潜伏者》中汤姆-汤姆身份的不确定性

毕宙斌<sup>1,2</sup>

(1.海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2.海南省外文海南文献与舆情研究中心,海南 海口 570228)

**摘要:**澳大利亚作家玛丽安·梅·坎贝尔的小说《潜伏者》塑造了汤姆这位奇异的边缘人形象。她迷失于两性之间,渴望男女之爱却发现异性爱恋令人绝望;试图从女性那儿寻求亲密,又受到传统异性恋规约的羁绊。汤姆徘徊于土著和白人之间。作为父权制社会下的受害者,她自动与受压迫的土著站在一起,却又无法摆脱她是白人的现实。长期受着男权的压抑,汤姆经常陷入虚幻的梦境或者想象,恍惚中分不清现实与虚构。坎贝尔通过采用后现代主义的叙事策略,诠释了汤姆身份不确定性这一主题,并表达了她作为激进女权主义者对男权的抗议。

**关键词:**玛丽安·梅·坎贝尔;《潜伏者》;性别;种族;空间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0)05-0053-06

在《剑桥澳大利亚文学史》一书中,苏珊·利弗(Susan Lever)指出,女性作家在整个20世纪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地位显著。20世纪70年代国际女性主义运动将女性小说视为表现女性体验、表达女性思想的载体,使女性写作成为新的政治战地<sup>①</sup>。德利斯·伯德(Delys Bird)则认为澳大利亚小说传统由男性占据主导地位<sup>②</sup>,尽管这个观点与利弗不同,但两人一致认为20世纪80年代涌现了一批受女权主义思想影响的女性作家,比如凯特·格伦维尔(Kate Grenville)、贝弗利·法默(Beverley Farmer)、德鲁西拉·莫杰斯卡(Drusilla Modjeska)<sup>③</sup>、玛丽安·梅·坎贝尔(Marion May Campbell)等。虽然王腊宝<sup>④</sup>在梳理澳大利亚后现代小说时并未提及坎贝尔,但她确实“是一位在实验性的叙述方法上越来越受推崇的作家”<sup>⑤</sup>。坎贝尔的作品展现了出色的语言驾

驭能力,精心的结构安排和深度的主题挖掘,为她赢得了“澳大利亚最有影响力的后现代作家”之一的美誉。她的《航线》(*Line of Flights*, 1985)、《不是米里亚姆》(*Not Being Miriam*, 1988)、《潜伏者》(*Prowler*, 1999)等作品展示了运用当代理论和后结构主义技巧书写女权政治的可能空间和潜在问题<sup>⑥</sup>。

坎贝尔高度关注身份问题,作为一名激进女权主义者,她对“身份、对称和流畅的传统审美都持反叛态度”<sup>⑦</sup>。早在1993年,苏珊·米迪娅(Susan Midalia)就撰文论述过《航线》中的女性身份问题。在她的第三部小说《潜伏者》中,identify、identity、who are you这样的表述反复出现。身份探寻这一主题显得尤为突出,而身份认同研究是学界的一个热点。据2020年4月28日中国知网的数据,以“身份认同”为篇名,可检索到4743条

收稿日期:2020-04-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BWW054)和(18BWW087)

作者简介:毕宙斌(1981—),女,江苏吴江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澳大利亚文学及生态批评研究。

①Lever, Susan. “The Challenge of the Novel: Australian Fiction since 1950.”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Peter Pierce,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509.

②Bird, Delys. “New Narrations: Contemporary Fictio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Elizabeth Webby,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86, 197.

③黄洁:《小天地与大世界》,苏州大学,2013年。该博士论文梳理了当代澳大利亚女权主义小说发展脉络,并重点讨论了包括莫杰斯卡在内的四位女性作家。

④王腊宝:《澳大利亚后现代小说述略》,《外国文学》2014年第1期。

⑤Gelder, Ken, and Paul Salzman. *The New Diversity*. Melbourne: McPhee Gribble Publishers, 1989, p. 80.

⑥Campbell, Marion May. “Telephony or Phoney Telos.” Heather Kerr and Amanda Nettelbeck, ed. *The Space Between*. Perth: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Press, 1998, p. 217.

结果。早在1998年,宋伟杰就以金庸小说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身份认同的“混杂”与文化记忆缺失症<sup>①</sup>。2004年陶家俊则论述了从现代到后现代身份认同的变化<sup>②</sup>。

崔萌认为“认同”是“来源于社会心理学的集体认同和自我归入理论,它习惯被用来回答‘我是谁’的问题”<sup>③</sup>。王成兵则认为“现代人在社会中塑造的、以人的自我轴心展开过程中会围绕着各种差异轴(譬如性别、年龄、阶级、种族和国家等等展开),其中每一个差异轴都有一个力量的向度”<sup>④</sup>。《潜伏者》这部小说描写了多种认同差异轴,本文拟从男性与女性、白人与土著、现实与想象这三组关系入手,探讨《潜伏者》中女主人公的身份探寻,并阐明坎贝尔是如何通过反传统的写作方式来实现她的政治意图。

### 一 假小子的双性恋

《潜伏者》以倒叙的方式开篇,讲述了汤姆-汤姆44岁的短暂人生。小说采用了双人物的叙事结构,第一条线是汤姆-汤姆(Tom-Tom/Thomasina)作为叙述者,以日记的形式记录她的人生历程;第二条线则是以卢·巴尔布(Lou Barb)的视角展开,描写了她和汤姆-汤姆的友谊和成长经历。两条线相互交织,交替出现,每条线下又时空交错。汤姆-汤姆的母亲,和《黄色墙纸》中的女主人公一样,患上了产后忧郁症。在母亲上吊自尽后,她随祖母梅芙(Maeve)一起生活。

汤姆-汤姆的着装打扮体现了她在性别认同方面的不确定性。小说53页展现给读者的是不拘小节的假小子(tomboy)形象:总是丢纽扣,干洗后的第一天又不知怎么弄脏了衣服,头发干缠在一起,裤脚拧在脚踝上;穿着帆布鞋、毛衣和牛仔褲<sup>⑤</sup>。小说140页,巴尔布先说汤姆貌似假小子,又称她像男扮女装的变装皇后(drag):“到了周末,汤姆下身穿穿着牛仔裤或短裤,上身却是一件60年代款式的高腰线浅黄色迷你裙,胸下各有一个娇羞的小蝴蝶结。她棕色腿上粗糙的腿毛更增添了这种效果。还有鞋子,像船一样!她可能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不穿胸罩的人;她试穿这件小

裙子、在宿舍里笑着昂首阔步时,我可以看到深色的乳头透过棉布在颤抖。”通过巴尔布对少女时期汤姆的外表描述,读者可以看出汤姆似乎对生理性别特征并不敏感,着装方面体现出雌雄同体的性别模糊概念。

汤姆在两种性别间的摇摆更体现在她的情感方面。她暗恋的第一位女性是她中学美术老师伊娃·霍夫曼(Eva Hoffman)。据巴尔布回忆,汤姆向她坦言,自己对霍夫曼到了一种近乎病态的痴迷,无法停止对霍夫曼的思念,想念她的怀抱和拥抱,甚至会设计路线去迎合霍夫曼的日常生活路径(59)。有个周末,汤姆甚至为了霍夫曼坐车前往珀斯(Perth)美术馆,目的是观看霍夫曼喜欢的斯坦利·斯宾塞的艺术展,并写点感受。在巴尔布看来,汤姆每一项任务的完成都像是伊娃的一种奉献,她要用自己获得的任何材料去激发霍夫曼对她的迷恋(141)。令巴尔布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汤姆与霍夫曼发生亲密举动时表现出来的放松状态:“汤姆-汤姆闭着眼,把头枕在霍夫曼的大腿,霍夫曼一只胳膊和手腕撑在汤姆头边,一手捋着、抚摸着她的头发。”(59)作为旁观者的巴尔布提醒汤姆-汤姆,霍夫曼可以做她妈妈了!

汤姆对这种温暖和柔情的渴望与她的经历密不可分。她从小了解到的是祖父对祖母的背叛与抛弃,以及父亲对母亲施舍般的照顾:“我给她钱买漂亮裙子,她肯定会高兴。”(28)母亲不过是父亲的附属品,而父亲“引以为豪的是母亲的美丽”(28),并不关心母亲的情感需求。美丽的母亲甚至很可能沦为父亲欲望的客体。家庭中男性温暖的缺失或许令她对异性恋不那么向往,转而发展同性恋情,然而巴尔布这样循规蹈矩的女性朋友却在不断提醒她,同性恋是不合常规的。在汤姆中学同学奥黛特(Odette)看来,“汤姆-汤姆在法国的经历是耻于言说的,那些演员、那些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们!”(49)正如朱迪思·巴特勒所言,尽管罗斯、米切尔和其他拉康女权主义者坚持认为,身份总是不稳定和不确定,但她们仍然将这种不稳定的条件固定在一个在文化上不变的父权法律上。其结果是一个被叙述的起源神话,在这

①宋伟杰:《身份认同的“混杂”与文化记忆缺失症——管窥金庸的小说世界》,《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②陶家俊:《同一与差异:从现代到后现代身份认同》,《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③崔萌:《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视域下的集体认同观》,《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④王成兵:《当代认同危机的人学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⑤Campbell, Marion May. *Prowler*. Fremantle: Fremantle Arts Centre Press, 1999, p.53.(下文引自该小说的不再另行标注,只在文中直接标页码。小说中常将Tom-Tom写为Tom,与小说保持一致,下文中汤姆-汤姆会写成汤姆。)

个神话中,通过法律的无情力量,原始的双性恋被硬生生地变成了忧郁的异性恋<sup>①</sup>。

汤姆与第一任丈夫阿西夫(Asif)的异性恋以失败告终,与第二任丈夫莫里斯(Maurice)的婚姻因她失去生命而结束。阿西夫是她在法国上戏剧课时的同学,是阿拉伯裔移民,在马赛处于社会底层,居住在贫民窟。汤姆十分迷恋温柔时的阿西夫,然而阿西夫常有的家暴行为导致她不得不求助警察和法律结束这段婚姻。在巴尔布看来,汤姆不过是阿西夫逃离法国的工具,他并不爱她(241)。阿西夫到达澳大利亚后,汤姆成为全职太太,不仅要养育出生不久的卡里姆(Karim),还得照顾阿西夫的生活起居。汤姆日记中记录了两入因母乳喂养问题发生冲突后,阿西夫摔门而出后的窒息和难受:“我纵情哭泣,哭泣竟已成奢侈品。他想让我免费养育他。”(264)烦琐的婚姻生活也让汤姆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资产阶级、疯狂的洗衣工、食品采购者、尿布浸泡者(274—275)。破旧洗衣机发出声音时,会被阿西夫吼道:“就不能在我们聊天时关掉吗”;抑或她顶撞时,会被骂“臭婊子,洗你的衣服去”(275)。在两性关系中,即便是白人中产阶级的汤姆也还受制于社会底层的移民男性阿西夫,更别说对阿西夫“言听计从”毫不反抗的第二任妻子。身体的伤害、语言的暴力使得汤姆更加渴望同性间尚存的温情。每次怀孕,汤姆都是处于忧伤和焦虑的状态,而给她慰藉的却是巴尔布:“如果我去安慰她,我能从她眼中看到孩子般的满足,她会把我的脸拖到她布满泪水的脸颊,并求吻。”(242)

不管怎样,在两段婚姻中,汤姆都履行了异性恋婚姻中女性的生育职责:与阿西夫生了儿子卡里姆,与莫里斯生了女儿伊西多尔(Isidore)。“伊西多尔”,是英法两国男性使用的名字,意为“伊西斯的礼物”,伊西斯是古埃及神话中孕育生命的女神,是完美女性的典范。该名字的含混性彰显了汤姆在性别认同方面的不确定性。坎贝尔在主人公的取名上独具匠心,有意表现她的性别徘徊。托马西娜本是女孩子的名字,但是当祖母和朋友称呼她时,总会改成汤姆-汤姆,甚至有时会简化成汤姆。汤姆这种男性化的名字也模糊了她的性别意识。

王腊宝和王丽萍认为,受女权主义思潮影响

下的澳大利亚女作家在表现两性关系时特别关注失败的婚姻、无望的爱情、单身的选择和同性的恋情这四种题材<sup>②</sup>。汤姆经历了失败的婚姻,婚姻中充满了性别压迫;她慨叹爱情难觅,却又渴望亲密,不自觉地发展同性恋情。小说中还出现多处赤裸裸的性爱描写。可以说,坎贝尔在处理两性关系方面打破了传统的禁忌,这与女权主义思想是一致的。

## 二 何处为家

另一困扰汤姆的问题是她究竟属于哪里。无论是在澳大利亚还是法国,汤姆一直都在流放。小说中 exile 出现了 21 次, stranger 出现了 14 次, alienation 也反复出现。对于巴尔布这样的白人来说,自小“过着波希米亚式生活”(74)的汤姆是个“奇异的边缘者”(109)。汤姆和祖母住在珀斯郊区一个名为“Banksiafold”的地方,与尼翁加(Nyoongar)部落的乔(Joe)、米莉(Millie)、扎克(Zak)、乔西(Josie)等土著居民生活在一起。她倾听他们的故事,汲取土著文化,与他们建立深厚感情,感受着澳大利亚原始土地的魅力。她坦言,“随着和米莉、乔的交往,甚至梅芙是牛奶咖啡色的,我不再相信白色”(42)。因此,她与蓝眼睛、白皮肤的中学朋友奥黛特(Odette)逐渐疏离。当祖母临死前告诉她,奥黛特的父亲在电视上推动矿业公司和传统土地拥有者的买卖协议时,汤姆甚至为与奥黛特的联系感到愧疚(184)。而奥黛特致信给莫里斯时,不无讽刺地认为,“汤姆抵触她,抵触这中产阶级联系,她可能在说服自己还是个激进分子”(340)。

汤姆痛恨同肤色白人进行的一系列“破坏”活动,他们侵占土著的土地、忽视土著的仇恨:“我看见西服在风中飘动,他们的领带在肩头飘扬,出售纵向空间,进行采矿交易,把国家采尽,把古老森林作为纸箱饲料送走;见识他们操作股市、交易城市空间,看到因他们的贪婪而造成的荒凉地区”(107)。那些所谓的“无人区”成为白人殖民者们获取利益的场所,而无人区的原住民则成了野蛮的阻力。

汤姆抗议白人对土著的迫害,深切同情土著,然而,了解到米莉和白人男性所生的双胞胎孩子如何被政府骗走之后,她“十二岁时意识到自己

<sup>①</sup>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Linda J. Nicolson, ed. *Feminism/Postmodernis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0, p.332.

<sup>②</sup>王腊宝,王丽萍:《女权、爱情与当代澳大利亚女性小说》,《当代外国文学》2009年第4期。

不会变黑,我无法选择黑肤色……不管我和尼翁加家庭多么亲近,我都无法置身于他们的空间。你的缺失,你的忧伤,和他们的是不一样的”(112)。毕竟,“被偷走的一代”的家庭悲惨命运是土著的特有经历,而她终究是白皮肤的。

一方面,汤姆无法完全融入土著,另一方面,她要逃离澳大利亚白人主流文化,她毅然决然地拒绝学习那些她称之为“入侵者”的白人的文化,最终选择了自我流放。流放只为了一个目的:为了保持彻底的分离(113)。马赛是一座人口主要由流放者构成的城市:“这里没有陌生人:从腓尼基人开始,这个城市就是由陌生人建造和提供燃料的,流放是它的永久居住地……”(81)。马赛处于法国的边缘,且在巴黎人眼中也处于法国文化的边缘,被巴黎人认为只有所谓的坏品味。对马赛人异质性存在的描写能让人更深刻地感受到,马赛与巴黎是相对立的。这种异质性挑战了类似‘法国人’这样的术语的同质化倾向,流亡者在马赛变成了“马赛人。”<sup>①</sup>

马赛的经历迫使汤姆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戏剧课老师将表演的主题定为流放,并请四位学员用意象做自我介绍。汤姆使用了金色的拔克西木树(banksia tree)来界定自己的身份。她进一步补充,是被迫沉默的可发声物体(a speaking thing held mute)(95)。Silence、silent和mute这三个词在小说中分别出现了27次、10次和22次,可见频率之高。汤姆将拔克西木这种澳洲著名的本土原生植物作为自己的意象,似乎在表明认同原住民的立场。尽管她不能成为真正的土著,但她和土著的共同之处在于她们在这个白人主导的男权社会都被剥夺了话语权。然而,阿西夫发问:“你是谁,姐妹,你认同谁?”汤姆回答他“我从无人之地来,入侵者是这么写我来的地方”(99)后又补充:“我们打算把我们的土地归还给我们的尼翁加朋友。”阿西夫继续对她进行灵魂拷问:“你自己难道不是入侵者吗?激进的拔克西木妹妹。你怎么能说要把你们的土地归还他们……没看见你脸红。我们的土地!我猜你就是通过你偷来的余钱旅行的。”(100)阿西夫咄咄逼人的发问迫使汤姆不得不正视自己是“资产阶级白人”这个事实:“是阿西夫让我认同这些白种人的,我记得我是在旅行,就像他说的那样,我偷了多余的东西。我觉得我无法抗议。我自己怎么不是入侵者?”

(107)

尽管汤姆认识到自己的白人生理属性,但是她与白人中产阶级莫里斯的第二段婚姻并未让她找到归属感。汤姆与土著朋友逐渐失去了联系,她感觉自己“如同契科夫短篇小说‘哀伤’中的格里戈里,迁入白色”(291—292)。莫里斯是巴尔布研究所的同事,为政府提供土地退化、海草消耗、碳燃料排放的统计数据。这个研究所一直得到矿业公司的基金资助,而矿业公司为了不断地开采原住民土地,甚至“要通过水洼下毒的方式制造土著大屠杀以实现西北部的全面开采并出口铁矿石”(338)。当汤姆得知土著居民面临从家园被赶走的境遇时,她选择不再和为殖民者利益服务的莫里斯交谈,决定自己采取行动。作为一名在男权社会受到压迫的白人女性,汤姆站在同样是受压迫者的土著那边。赶往Banksiafold前,她穿上在马赛上表演课时的拔克西木套装:“或许我能穿得上它。我不再流放。”(370)

### 三 幻想者的虚实空间

我是红头发疯子凡高的情人,想象着过和他一样的生活,任其将我带入真实生活以外的其他空间。(315)

*I was Fou Roux's lover by living his pictures and I let this take to other spaces within the places of my life.*

从前文的论述可以看到,汤姆在自己究竟是男性/女性、白人/土著这些方面是摇摆不定的。她时常处于恍惚之中,分不清现实空间和想象空间。汤姆自幼喜欢幻想,儿时的她居住在外婆特意为她建造的侧屋(wing),这个侧屋有供徘徊者使用的大落地窗。汤姆儿时的幻想主要以大落地窗为载体。透过玻璃,她进入到一个时间流淌较慢的空间,可以连着几个小时看着迷人的金色拔克西木穗敲打着玻璃,看着闪闪发光的它们被玻璃俘虏锁住。汤姆将侧屋比喻成“我的翅膀,我可以飞到另一个地方”(20)。侧屋承载了她内心无限的遐想:她可以在这里看到各种各样的父母形象,她可以召集老太婆魔鬼、狼、拔克西木人、巫婆以及所有的妖怪到落地窗外,看着他们把充满急切表情的脸贴在玻璃上。汤姆在自己的想象空间里不仅可以自由翱翔,还拥有主导权。

汤姆的情绪也常被梦境左右,时而欢喜,时而

<sup>①</sup>Rany, Tracy. "'The Living Hyphen': France and Australia in Two Novels by Marion May Campbell." *Southerly Journal* 2015 (4): 7.

悲伤,她仿佛分不清梦境的真与假。比如怀第一个孩子卡里姆时,她经常做噩梦。有时梦见这个孩子是她的女性伴侣莫莉的,有时是戏剧课老师元蜘蛛的,有时又梦见莫莉和阿西夫一起变成危险的舞动物体将她驱逐,有时甚至梦见这孩子是祖母的。梦醒时分,她会将头埋在枕头上抽泣。或许怀孕让她想起了自己出生后完全失去自我空间的母亲。结婚后,汤姆父亲就不再允许有才艺的母亲在家门外用歌声表达情绪,这使得母亲越来越压抑。在怀汤姆前,父亲还偶尔允许母亲在外担任给她带来一些快乐的代课老师。但是产后,母亲只能没日没夜地喂养因患舌系带短症而不能正常吮吸乳汁并不停尖叫的汤姆。按祖母的说法“你父亲从未意识到,如果他乐意将孩子抱在怀里,这样你母亲就可以洗个澡或者坐在凉亭上,就能有五分钟听不到你哭的时间”(26—27)。汤姆的梦看似荒诞,但在梦境中否认自己的母亲身份或许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或许是在质疑传统女性必须承担的母亲角色。

随着卡里姆长大,莫里斯“惊讶地看到汤姆这位昔日的女权主义者居然受儿子控制到如此程度”(331)。汤姆会一直等到凌晨3点,听到儿子回来的声音后,立马轻手轻脚去他的房间,并告知已帮忙打扫屋子。她还会帮儿子叠好衣服并归类,一副贤良淑德的模样。但是,在巴尔布看来,根据汤姆对她的叙述,汤姆更像是分不清她是儿子还是想象中的情人,“接近乱伦”(328)。但卡里姆不是汤姆想象的第一位情人。

12岁时,汤姆看着画卷曾一度幻想自己是红头发疯子凡·高的情人:“我与他一同欢舞:教堂外,星空下,我是新郎,我是新娘。”(39)汤姆追随他去了法国的阿尔勒、比利时的灰暗小镇,还去了他当牧师时的那个矿区小屋。在小屋,他们拥抱在一起,呼吸急促;屋子变暖了,黑暗中充满了色彩。当汤姆的手指掠过他的肩膀、他的手指抚摸汤姆的头发时,汤姆感觉到自己“与凡·高宣扬的上帝如此亲近”(40)。这种幻想未曾从汤姆-汤姆的生命中褪去过,即使年过四十,汤姆-汤姆仍在她的日记中记录自己是凡·高的情人,因为凡·高使她可以想象真实生活以外的其他可能空间。

这里的凡·高可以说是个隐喻,是非理性的疯癫提供给女性的另一种生存空间。这让人想到

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M. Gilbert)、苏珊·古芭(Susan Gubar)的巨著《阁楼上的疯女人》。没有经济来源的汤姆在第二段婚姻中依附丈夫,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然而,她的心中一直都藏着一个邪恶淫乱、狂野反叛的魔鬼妖妇。不管是对她的儿子,还是阿西夫的侄子,汤姆都有过性幻想。

不管是幻想还是梦境,汤姆的想象空间与现实空间相互渗透,难分彼此。在马赛戏剧工作坊时,舞台角色和现实身份更加难以分辨。在汤姆的笔下,老师西蒙娜·乔塞尔的意象是可以在蛛网操控猎物的元蜘蛛,汤姆是无声的拔克西木,莫莉是风滚草,阿西夫是流放的破手提箱,巴西利奥是影子。在现实中,他们五人还是以这样的名字称呼对方,并以这些物体的特性为指导继续生活。而且,元蜘蛛的蛛网控制不仅体现在课堂上话语权的掌握,还体现在生活中,利用他们的移民身份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

现实和虚构模糊难辨。读者也许会觉得汤姆是个神志不清的疯癫女性。日记的结尾,中年的汤姆仍认为自己有三任丈夫,但莫里斯坚定地说他是她的第二任丈夫。莫里斯在日记中被简化为一个无名无姓的“第三任丈夫”,这让他感到无比羞辱和震惊。让他更为痛苦的是,汤姆居然以第一人称记录了自己是第三任丈夫这样的白日梦。长期以来,女性不仅生活在男权统治的现实中,而且生活在男性话语的书写中。汤姆总是生活在幻想中,分不清真假,但用这种剥夺男性姓名和身份的方式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男性话语权。

王岳川在论述后现代写作时,总结援引戴维·洛奇在其《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即,后现代主义同样反对现代主义的典型观,以及理性主义的再现模仿和人与世界的意义模式,攻击其对确定性的追求,宣布“不确定性”是自己的本质特征<sup>①</sup>。坎贝尔在写作过程中消弭了真实与虚构、现实与想象、过去与现在,通过空间的转换、时间的跳跃、体裁的交织、叙事视角的不断切换等,展示了后现代叙事的不确定性、多元性和复杂性。

## 结语

1948年出生的坎贝尔是在澳大利亚20世纪七八十年代第二波激进女权运动和90年代第三

<sup>①</sup>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6页。

波后现代女权运动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学院派女作家。受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不少激进女权主义作家从文本内部颠覆男性主导的文学领域,“通过采用拼贴、迷宫式的开放性叙事等后现代技巧解构男性文学传统,批判社会不公和暴力”<sup>①</sup>。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言,任何内容总要具有某种形式,任何形式总要表达一定的内容,世界上没有只有内容而没有形式的实体,正如不存在不具备内容的抽象形式一样<sup>②</sup>。坎贝尔通过革新词汇、标点、句法、叙事视角等方式去挑战男性权威。《潜伏者》中人物对话没有标点符号,不同视角下描述的对话多以斜体标注,而“标点符号体现的是逻辑和理性的思维,斜体比起引号更能体现出叙事视角变化的突兀,话语内容也变得非常无礼、冷酷,仿佛回荡在耳边”<sup>③</sup>。读者需要继续仔细阅读才能明确谁在对话,有时一直到结尾处才能解开开篇人物的身份谜题<sup>④</sup>。因为小说摒弃了简单的线性情节和清晰的人物表达,读者通过前后联

系、反复推敲才能得出一个按时间顺序发展的线性叙述。从某种意义上说,坎贝尔挑战了男权社会推崇的理性与逻辑。并且,小说中表现出的不确定性消弭了中心与边缘、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感性等二元对立,帮助坎贝尔实现消解男权中心的政治意图。需要注意的是,《潜伏者》出版于1999年。这一年也是在七八十年代秉持激进政治立场的女权主义者海伦·加纳出版纪实著作《第一块石》的年份。这部作品想要告诉读者,女性若要在公共领域获得自由和平等,想要抛头露面,性骚扰是她们需要接受和承受的。寻求两性间的和解和相互理解是理想的结果,但女性独立需以接受以性骚扰为代价这样的思想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然而,坎贝尔对汤姆及其母亲非疯即死的命运安排表明她在90年代末仍保持了控诉男权的激进政治立场<sup>⑤</sup>。可见,尽管她试图用这部后现代小说叙事去挑战男权,但在她看来,澳大利亚当代女性想要实现真正的平等和自由,任重而道远。

## Approaching the Uncertainties of Tom-Tom's Identity in *Prowler*

BI Zhou-pin<sup>1,2</sup>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for Overseas Studies and Media Reports on Hainan, Haikou 570228, China)

**Abstract:** Australian writer Marion May Campbell's novel *Prowler* portrays Tom-Tom as a fringe dweller.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homosexual and heterosexual relationships, it is difficult for Tom-Tom to define her own sexuality as she oscillates between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She longs for heterosexual love which she finds frustrating; she tries to seek intimacy from women, but is fully aware of the unconformity of homosexuality. It is also hard for her to define her racial identity, being confused about who she is, i.e. Aboriginal or "bourgeois white". As a victim of patriarchal society, she identifies with the oppressed Aboriginals, but can't deny her white skin. Having been suppressed by patriarchy, Tom-Tom often falls into illusory dreams or fantasy, being unable to distinguish her real space and imaginary space. By adopting postmodernism narrative strategies, Campbell interprets the theme of Tom-Tom's uncertain identity and expresses her protest against patriarchy as a radical feminist.

**Key words:** Marion May Campbell; *Prowler*; sexuality; race; space

(责任校对 朱正余)

① Bird, Delys. "New Narrations: Contemporary Fictio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Elizabeth Webby,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83.

② 王佐良:《英语文体学引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0年版,第515页。

③ 刘世生:《文体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页。

④ Birns, Nicholas. "Marion Campbell's 'True Fiction'." *Antipodes* 2 (2006), p206. Birns指出,当今有两种实验性写作,一种是益智小说(puzzle novel)代表作家有以满足大众需求为导向的丹·布朗和以开放结局为特色的大卫·米切尔,另一种则是坎贝尔、芭芭拉·汉拉汉、弗拉姆和默南所写的谜题小说(enigmatic novel)。

⑤ 王丽萍:《告别激进女权主义——评凯特·格伦维尔的小说〈黑暗之地〉与〈完美主义〉》,《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王丽萍认为,澳大利亚不少激进女权主义的立场到了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变化,寻求妥协,甚至同情男性。